

史诗树丰碑

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

34

甘肃人民出版社

史诗树丰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8,000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7

书号：10096·177 定价：0.33元

目 录

一朵鲜艳美好的香花

——评话剧《西安事变》……………肖 华 (1)

毛泽东同志统一战线思想的颂歌

——话剧《西安事变》观后……………汪 锋 (8)

史诗树丰碑

——从话剧《西安事变》谈塑造领袖

人物的艺术形象……………赵 寻 (18)

理直气壮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

……………李振玉、杜清源 (26)

《西安事变》的艺术成就……………谢昌余 (32)

花开“禁区”内，留香在人间

——话剧《西安事变》读后……………金行健 (42)

伟大历史的生动写照

——赞话剧《西安事变》

……………王家达、王守义、赵毅 (55)

大胆的创作 优异的成果

——评话剧《西安事变》……………颜廷亮、陈进波 (65)

漫谈《西安事变》革命历史剧……………陈志明 (77)

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形象

——评话剧《西安事变》学习札记…余开伟 (90)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颂歌

——话剧《西安事变》观后……雷茂奎、刘 南（100）
不朽的业绩 光辉的形象

——看话剧《西安事变》……李士文、李 谦（106）

力图再现历史的光辉

……………西安电影制片厂、甘肃省话剧团《西安事变》创作组（112）

《西安事变》在排演中

——摘记舒强同志在排演场的艺术指导……………

……………白敬中（127）

《西安事变》导演札记……………刘 韧（147）

毛主席舞台形象的探索道路……………高信生（160）

我扮演周副主席的体会点滴……………郑世和（173）

蒋介石的角色创造……………洪 涛（177）

《西安事变》舞台美术设计札记……………董兆俭（185）

艺苑踏新路

——记甘肃省话剧团《西安事变》的创作和演出

……………祖伯光、周德广（193）

一朵鲜艳美好的香花*

——评话剧《西安事变》

肖 华

看了《西安事变》的演出，听了省话剧团在北京演出情况的汇报，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认为这个戏是成功的，是一出好戏。这个戏好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好就好在思想性高。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这就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写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反映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的多，写统一战线的戏不多，有过《东进序曲》，还看过几个剧本。《西安事变》写的是中华民族的转折关头，由国内战争转为民族战争。这个戏是写统一战线的，是很好的，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很好地体现出来了，很概括，很集中，体现了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周总理是怎么贯彻的，把原则性、灵活性都体现出来了。如果作者没有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好地学习党的历史，很好地学习党的三大法宝和了解掌握这一题材，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毛主席说政治标准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剧在这些方面都较好地体现出来了。

其次，这个戏好就好在艺术性高，不是标语口号式的，而是通过人物、情节、语言、演员表演，活生生地表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毛主席说的第二个标准，艺术标准，这个剧本也

较好地体现出来了。三个小时的戏，越看兴趣越高，真正抓住了观众，吸引了观众。

再次，这个戏好就好在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形象搬上了舞台。周总理成了主角，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心愿。人民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半个世纪来，“三老”领导中国革命，建立了光辉的业绩。表现“三老”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丰功伟绩，这个剧本还是第一次。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形象一出场，大家热烈地鼓掌。西安事变如果不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伟大气魄，谁能解决？那时候，我们天天和蒋介石打仗，天天喊“打倒蒋介石！活捉蒋介石！”而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住了又要放掉，当时我们想不通。我们的领袖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很大胆，很果断，很有魄力地解决了。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周总理具体贯彻。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以及解放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长，最得力的助手，最忠实的战友。周总理处理西安事变这个难题，解决得很好。这个剧本把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形象搬上舞台，使观众看到、学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伟大的品格，是最好的传统教育。大家很受感动，很受教育。

最后，这个戏好就好在有独创精神，不是一般化，老一套。我们长期受林彪、“四人帮”的框框束缚，讲话、写文章都抄报纸，不然就要被打棍子、戴帽子、送班房，受到专政的待遇，使我们的作者、导演、演员戴上精神枷锁。粉碎了“四人帮”，文艺工作者得到了解放，文艺的春天到来了。

这次，《西安事变》的作者突破了框框，话剧《西安事变》是文艺春天里开放出的一朵鲜艳、美好的香花。我们要有独创精神，独立思考，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大胆的概括，大胆的集中，把人民的斗争生活表现出来，不能老一套，一个模式。“四人帮”就是老一套，就那么几个戏，后来票也卖不出去，你不想看也得看。他们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使作者的才能受到压抑，风格表现不出来，是一潭死水，不是活水，毫无生气。文艺要不断地出新，这样才有生气，才能随着斗争不断发展提高。《西安事变》就敢于创新，敢于独立思考。说它气魄大，也就大在这个地方。把这么多的正、反面人物，还有中间势力，统统搬上舞台，把这么复杂的矛盾概括起来，而且有主有次，很大胆，气魄也很大。作个关于西安事变事件的报告，起码也得半天才能说清楚，而这个戏三个小时就演完，观众就看清楚了。我对这个戏的创作很感兴趣，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希望随着《西安事变》这个戏的出现，我省文艺界有更多的花朵开放出来。

《西安事变》的演出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粉碎了害人的黑帮、一群害人虫，人民得解放，文艺工作得解放，不然剧本出不来，再好的演员也演不出来，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要受到镇压。剧本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华主席率领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毛主席的路线才能得到贯彻，文艺工作才能解放，在甘肃才砸烂了“四人帮”代理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剧本的创作提供了条件。所以说剧本和演出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归功于党的十一大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只要我们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

事，按照党的十一大路线办事，文艺的花朵就会开放得更加繁荣、茂盛。《西安事变》的成功，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不只是甘肃省话剧团，而且也是甘肃文艺界的喜事。话剧团的同志走了第一步，他们贯彻十一大路线，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贯彻得好。不然，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这是值得我们兰州部队文艺工作者学习的。

这个戏的成功，还要归功于甘肃省话剧团的领导、作者、导演和全体演员同志们，他们对这个剧本付出了劳动，付出了代价。他们受“四人帮”迫害很深，感受很深。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路线觉悟高，思想感情和毛主席、和党、和十一大路线、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溶合在一起的，和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感情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受到热烈的欢迎。任何人要开倒车，反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是绝不能答应的，让长江、黄河的怒涛把他们淹没掉，而且也已经淹没了。

甘肃省话剧团是有基础的，是个老团，领导、编剧、导演、演员、舞美，都有不少老同志，是有水平的。这次发挥了他们的长处，各方面是成功的。

这个戏的成功，还要归功中央文化部的同志对甘肃文艺事业的关怀和支持。中央文化部对话剧团《西安事变》的表扬和鼓励，也是对甘肃文艺界的鼓舞和鞭策。我们要以此为动力，把甘肃的文艺搞得更好上加好。当然，这个戏还要精益求精，把创作、导演、表演、舞美再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这次演出获得成功，还要感谢广大观众对甘肃两条路线斗争，甘肃的工作，甘肃各个方面的关心和支持。甘肃是

“重灾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很严重。我来甘肃时，有人说：你怎么去那儿？又甘又肃，不去新(疆)、西(宁)、兰(州)，要去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华主席、叶副主席和我谈话后，第三天我就来了。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听党的话，特别是有困难的地方，更应该去。来到兰州，来到大西北，我并不感到不好，很好嘛！长江、黄河都是在这儿发源的，西北潜力很大，是祖国很好的地方。我对外地同志说：我们这儿是上游，你们那儿是下游。祖国地大物博，不到西北来不知道。西北处女地很多，资源很多，自然条件好得很。我们的祖先早就生活在这儿，困难的路他们走了。西北有什么可怕的？蒋介石、美帝都被我们打败了，长征那么艰苦都过来了。我们要有爱国主义思想，大西北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还有两亿亩土地可开发，有困难，建设嘛！共产党人就是战天斗地，战胜困难的。

你们的《西安事变》去北京，有人怀疑：山沟沟来的剧团，有这么好的戏。你们为甘肃争了光。我们甘肃有困难，也有长处，好处多得很。你们上北京实际上宣传了甘肃，宣传了西北，代表了西北人民的新面貌。过去拿出去的东西太少，外面不了解甘肃。这么好的土地，反修前线，一千八百万人民，生龙活虎的局面，就应该给人另一种感受。话剧团是一支宣传队，派到北京的宣传队，通过文艺形式，改变人们对甘肃的看法。当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承认我们还有缺点，还有困难。这种宣传对介绍西北，开发西北有好处。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对开发西北很重视，华主席也很重视，我们一定要把西北建设好。

话剧团的领导、作者、导演、演员、舞美，费了很大的

功夫，没有辜负省委、全国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首都人民的期望，我内心很高兴。这是甘肃的光荣，甘肃文艺界的光荣。

对于听到的意见，我认为这都是出于爱护和支持。我们要敢于听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继续前进的表现。一个剧本不可能尽善尽美，要得到各方面的帮助，逐渐修改、加工、完善。中央文化部给了任务，要以你们的剧本为基础，改成电影剧本，这是很光荣、很严肃的战斗任务，同志们要象打仗一样去完成这个任务。

你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是良好的开端。这个戏已被人们重视，得到了这么多的关怀和支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志们，要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作为最好的礼物，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在座的有许多文艺界的同志，我不懂文艺，是文艺爱好者。我想要把文艺搞好，关键是抓好创作。搞创作必须深入生活，掌握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写历史戏，要掌握几十年的东西。革命历史剧写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了，不容易。要加强创作力量，现在剧本还少，歌少、舞蹈少，歌剧更少。我给兰州部队文工团出了不少题目，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够写的了。革命历史剧要抓紧写，再过十年，很多老同志都不在了，以后就不好写了。一方面军长征开始时八万人，到现在只剩两三千人了，要抓紧时机。创作源泉很丰富，我们这儿又是多民族地区，生活丰富得很。西北又是革命圣地延安所在地，光延安就够写的了。搞创作的要多搞出作品来，非得深入生活，深入实际不可。

我们是有人材的。这次《西安事变》不就是证明吗？当然这还不够。要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颠倒过来，要肃

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端正文艺队伍的思想作风。甘肃文艺界的同志，要掌握好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华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冤案、错案要平反，越快越好，把没有解放的人解放出来，落实好政策。同志们要努力创作，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打倒“四人帮”，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好条件，现在就象在大海里游泳，会什么姿势就来什么姿势，自由式、蛙式……什么都行，有华主席领航。再就是要加强艺术修养，做到又红又专。要给作者、演员们创造学习、交流、锻炼的条件，老演员带年青同志。文艺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的领导说：我不懂文艺，别问我。外行可以变成内行，要群策群力，加强领导，要关心文艺事业，多和文艺界的同志接触，把存在的问题反映到省委来。文艺团体要搞好团结，内部、外部都要团结好，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现在，放在我们文艺界同志肩上的任务很重，要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要通过文艺来宣传、鼓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全国目前是大跃进的局面。年青的同志能看到，年老的同志也能看到。为此，我们文艺战线的同志，要做出更大贡献，责任重大。我们是能够胜任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

最后，希望各个文艺单位，象话剧团创作演出《西安事变》一样，出更多更好的好戏、好歌、好舞，作为我们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为新的长征服务，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 这是肖华同志在中共甘肃省委负责同志接见甘肃省话剧团《西安事变》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标题是编者加的。

毛泽东同志统一战线思想的颂歌

——话剧《西安事变》观后

汪 锋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时候，甘肃省话剧团在北京演出了大型革命历史话剧《西安事变》。这个戏通过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重大历史题材，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赞颂了周总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不朽功勋。作为一个西安事变的参加者，我感到这个戏再现了历史事实，剧本写得是成功的；演出也有感染力，十分激动人心。它把我带回到西安事变前后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仿佛又置身于当年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指挥下进行的革命斗争之中。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我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主席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大祸迫近眉睫的时候，

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十月间，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十一月下旬，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下，我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全歼东北军一零九师，为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十二月间，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总路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尔后，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这个报告是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西北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并接我去见毛主席，接受重要任务。在鄜县套通源东村的前线总指挥部，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十分亲切地接见了，并同我连续谈了三天。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毛主席首先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一国的殖民地，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的阵营中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

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的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共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都是地方势力，是中产阶级的代表，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要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的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是代表我党同杨虎城进行谈判。主席说，这次去要随机应变，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和。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向毛主席表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谈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并且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向前看，少向后看，也就是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得到一个大解放。过去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十二月间，我带着毛主席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经过一番曲折到达西安。

在西安，我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将军会谈三次。我向杨虎城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说明了当前形势和我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杨虎城将军认为我党关于联合一切抗日部队的主张很好，但是对我党还有一些猜疑。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杨虎城提出的问题，认真进行了解释。毛主席这次派我去西安，是我党中央同杨虎城

的第一次直接联系。毛主席的这个重大决策，对杨虎城认识形势，了解我党的政策，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任务完成后，我回到陕北。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党中央派叶剑英、彭雪枫等四十多个同志到西安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到西安后，以《工商日报》记者等身分进行活动。

回想当年毛主席的教诲，看今天《西安事变》这个戏，总的说来是比较好地体现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形象地说明了西安事变的胜利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最后一场出现，更加深刻地表现了毛主席是引导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决策人和指挥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全剧中的话不多，戏也不多，但是台词写得很好，寓意深刻，比喻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革命气魄和广阔胸怀，以及毛主席所特有的幽默诙谐的性格特征。演员在塑造毛主席的形象上是下了苦功的，表演是成功的。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周总理在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各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统一战线方面尤为卓著。周总理在统战工作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高度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西安事变前后，总理反复指示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策略和方法，连一些细节也考虑得很周密。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嘛，就要同国民党的人员接触，和他们来往，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办法就不行喽！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要会应付。我们

是在抗日的前提下，旧瓶子装新酒，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走到政治上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发展自己，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的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破坏统一战线。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一些最右的反动势力，总理是主张坚决打击的。如当时耀县民团头子雷天一，控制我们从延安到西安的咽喉要道，经常袭击我们，使我党受到很大损失。总理指示把这个钉子拔掉了。总理每次布置工作，除去交待任务外，都教给我们方法。党中央派我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那次，主席指示后，总理也跟我进行了谈话，总理说：方针大计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总理特别指出，你去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后来的实践证明，总理这一指示很重要。我到西安后，多次找杜斌丞先生恳切交谈。杜斌丞先生向我详细谈了杨虎城的可能性和性格。这些情况对于我和杨虎城的谈判，以及以后我党开展杨虎城的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当年，总理亲自负责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为了争取和团结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总理冒着生命危险同李克农同志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直接会谈。周总理针对张学良的顾虑，分析了全国抗日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周总理还指出：要抗日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实行民主，只有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抗日才能胜利。周总理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